

# 全球化背景与当代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

刘 云

**内容提要** 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源于3个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非熟练工人。虽然他们支持伊斯兰主义的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但由于受全球化的推动，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不满，都反对凯末尔主义，并通过伊斯兰教的认同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从而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吸引这些对政府不满的社会阶层而扩大了自己的基础。

**关键词** 土耳其 全球化 伊斯兰主义 社会阶层

**作者简介** 刘云，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兰州 730070）。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兴起主要是由全球化推动的土耳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致。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3个阶级（或阶层）：一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二是非熟练工人；三是中等职业技术阶层和知识分子。这3个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地位的变化促使他们支持伊斯兰主义思潮与运动。

## 全球化时代 的小资产阶级与伊斯兰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业主的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虽然进口替代工业的最终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受国家保护的国内市场需求，但它需要的资本和技术是进口的，要依赖国际市场，与全球化有密切的联系。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给土耳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引起了小资产者大量破产。厄基尔说，一旦传统状况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破坏，宗教作为式微状态下寻求更公正社会秩序

的阶层的激进意识便有了动力特征。<sup>1</sup> 这些小资产阶级对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且受政府保护的大企业家心存不满，他们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趋向保守，把伊斯兰教当做精神慰藉和斗争武器。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政党政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就是在受进口替代政策保护的大工业、大企业与在各省传统的中小企业的矛盾与斗争中产生的。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保守的宗教教团追随者和地方小企业主。

小资产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了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80年代以后他们又成为繁荣党和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80年代土耳其结束了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代之以出口导向经济战略，小企业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又兴旺起来。全球性小企业的扩展是转包合同（sub-contract）形式发展的结果。这种趋势在第三世界更加普遍。由于全球化，跨国公司已将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主要模式即使用贸易网络将劳动

---

<sup>1</sup> See D. Ergil, "Secularization as A Class Conflict", *Asian Affairs*, Vol. 62, February 1975, pp. 69-80.

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全球分散，并使企业小型化，这些小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品牌制造商联结在一起。<sup>1</sup> 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正是在这种小企业增长趋势下找到了理想的环境和条件。

最近几十年，土耳其的中小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并被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有人对 5 个省城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80% 以上的中小企业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一半是在 90 年代以后建立的，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中的新建企业最多。这些企业近一半是转包制造商，给它们提供承包订单的既有国内公司，也有国外公司。20 世纪 80 年代后土耳其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建立工业园区鼓励了这一趋势的发展。1996 年，这种园区有 36 个，进驻这些工业区可以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但中小企业还是经常抱怨政府的支持不够得力。各省的包工头及伊斯坦布尔贫民区的中等企业家，并不都是伊斯兰主义者，但伊斯兰主义者中的企业家主要来自中小企业。

在国家执行进口替代经济政策时期，获得资本积累和利润更多的是依赖国家政策而非市场。相应地，企业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与政府官僚的关系互动上，而不是如何开发市场。<sup>④</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政府结束了进口替代战略，但国家并没有退出经济领域，国家与企业家间的依附关系依然存在。<sup>⑤</sup> 近几十年困扰土耳其政坛的腐败丑闻即由这种局面所致，这也是繁荣党、正发党受欢迎的原因。人们认为，在所有政党中，繁荣党及其后继者正发党是最廉洁的，其他主要政党在执政时期都卷入到了各种腐败事件中。更重要的是，繁荣党、正发党不断为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家阶层的利益呼喊。

企业家阶层的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也可从亲凯末尔主义的企业联合会与亲伊斯兰主义的企业联合会的比较中发现，“土耳其工商企业家协会”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大企业家建立的，“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则主要由中小企业在 1990 年建立。由于土耳其出口导向经济战略的作用，这些中小企业的数量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迅速增加，这些企业通过转包合同生产受大资本的剥削，但又得不到国家的保护。这些企业在国家机构中没有代理人，政府政策总是支持大企业。在

繁荣党执政前的十年内国家机构和国家银行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只占总贷款量的 3%~4%。<sup>1/4</sup> 而从 1990 年以来，小企业占土耳其制造业企业数量的 90%，雇用人数超过了制造业从业人数的 1/3。<sup>1/2</sup> 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在 1998 年第一季度有 3 000 名会员，代表了约 1 万家公司，这些公司雇用人员约有 50 万。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也有一些规模较大和增长很快的成员公司。但这些公司的历史不长，并与传统的大企业有明显区别，传统的大企业仍然依赖国家，并拥护凯末尔主义。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代表了新兴和边缘化的企业家阶层，繁荣党提出的“公正经济秩序”的纲领描绘了一幅由这些企业家构成的平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蓝图。这些新的企业家阶层是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持者。

伊斯兰主义者经常提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与那些行为正当、工作努力、但背景艰辛的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繁荣党即使在 1995 年取得大选胜利后，都始终谴责那些“寻租者”。独立企业家协会在关于 1997 年土耳其经济的报告中也指出，“寻租者”利益圈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进程，这种破坏在繁荣党政府下台过程中达到了顶峰，正是他们的鼓噪造成了繁荣党政府的危机。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主义经济学家穆斯塔法·厄扎尔对藏在凯末尔主义背后的“寻租者”圈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这些“寻租者”现在仍然通过国家的保护剥削人民；这些“寻租者”由专利人、高利贷者、进口替代政策造成的假冒企业家组成，他们都是靠政府保护剥削国内市场的搞客。

这种话语也是繁荣党、正发党在工人阶级中受到欢迎的关键。伊斯兰主义者将剥削者说成是

<sup>1</sup> See Gary Gereffi,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Barbara Stallings (Ed.),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④</sup> See Ziya Onis, *State and Market*, Istanbul, Bogazici Vnverbiy Press, 1998, p. 244

<sup>⑤</sup> See Ayse Bugra, *State and Business in Turkey: A Comparative Stud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 264.

<sup>1/4</sup> Nadir Sugar, "Small Firm Flexibility In Turkey," *New Perspective on Turkey*, Vol. 16, 1997, pp. 99-100

<sup>1/2</sup> Theo Nichols and Nadir Sugar, "Small Employers in Turkey,"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2, 1996, p. 231.

依赖政府和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人, 从而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伊斯兰主义者的平民主义呼吁使其以政治认同方式成功地将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受益者与失意者都团结在它的周围。<sup>1</sup>

## 全 球 化 时 代 的 工 人 阶 级 与 伊 斯 兰 主 义

支持伊斯兰主义的第二股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 其中主要是非熟练工人, 即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无产者。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向世界的扩展, “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sup>④</sup>。最近几十年土耳其的城市化显然是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也是现代性向全球扩展的重要表现和内容之一。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与技术的注入, 因此和全球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经济的繁荣又为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 前面已经讨论了 80 年代以后全球化对土耳其中小企业的推动, 这些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断增长的中小企业为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移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从而推动了土耳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通过转包企业, 伊斯坦布尔贫困的移民社区妇女家庭计件工作和家庭作坊生产通过多层转包关系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所以, 近几十年土耳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受全球化推动的经济发展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 土耳其的城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城市人口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到 1990 年, 59% 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城市。由于城市的新移民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 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增强了, 这就使土耳其原先存在的两种文化在城市中对立起来, 并发生冲突,<sup>④</sup> 伊斯兰复兴不但存在于农村, 也存在于城市。新的城市居民逐渐割断了同农村的家庭、社会、宗教联系, “他们在城市里与大批陌生人相互接触, 面对新的社会关系, 他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 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来指导他们的生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正好满足了这些

需要。”<sup>④</sup>

快速的城市化没有提高工人的福利, 城市新移民处在城市最低层, 居住在贫民区, 面临失业威胁, 生活无保障, 从事城市的低级工作。被转包的小企业往往使用简单技术, 依靠“家庭、家族、手工和兄弟式的劳动制度”<sup>⑤</sup>, 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 几乎没有任何劳工组织。转包企业家与进行生产的妇女、儿童之间有或真或假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使劳动力贬值, 有时不管工作是在家中还是在作坊中完成, 都不支付货币工资。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城市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 32.7% 降到 80 年代后期的 20.8%。家庭收入的分配在这一时期恶化了。1994 年, 1/5 的高收入家庭所得占全国家庭收入的 54.9% (1987 年为 49.9%), 同时 1/5 的低收入家庭所得仅占 4.9%, (1987 年为 5.2%)。同年, 5% 人口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 30.3%, 1% 高收入者的收入则占总收入的 16.6%。<sup>⑥</sup> 低收入者对现行政策不满, 他们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价值观, 伊斯兰教自然成了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sup>⑧</sup> 以上数字解释了“正义”、“福利”等平民主义话语, 以及对“寻租者”的批评为什么能够吸引穷人和被剥削者。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也诉诸同样的话语, 但他们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竞争过繁荣党, 原因在于他们与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 世纪 90 年代, 社会民主党派衰落了, 代之而起的是繁荣党, 进入 21 世纪后, 正发党崛起。繁荣党、正发党在大城市周围的贫穷社区赢

<sup>1</sup> See Ziya On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slamic Resurgence in Turkey: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Party in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1997, pp. 743–766.

<sup>④</sup>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63.

<sup>④</sup> 指世俗主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

<sup>⑤</sup>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95 页。

<sup>⑥</sup>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asil Blackwell, 1989, p. 152.

<sup>⑦</sup> State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income distribution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survey results), Ankara, 1996.

<sup>⑧</sup> See E. M. Yapp, “Contemporary Islamic Revivalism”, *Asian Affairs*, June 1980, pp. 178–195.

得大量选票。<sup>1</sup> 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的“正义”、“福利”吸引了城市贫民；二是地方宗教组织和为城市贫民区的穷人提供帮助的宗教基金会发挥了政府所忽略的社会福利功能，使伊斯兰政治运动深入人心。调查表明，支持伊斯兰主义的大多数人对繁荣党纲领中的“公正秩序”和正发党纲领中的“民主”所知甚少，但他们相信伊斯兰主义政党会创造一个“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多数伊斯兰主义的支持者不是受到了宗教的鼓动，而是受到了政治需要的推动。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平民主义的宣传发动群众性社会运动的努力，主要是指向非熟练工人阶层的。当然，政治伊斯兰同样在熟练工人中赢得了支持。

### 全球化时代的 职业技术阶层、知识分子 与伊斯兰主义

全球化还包括社会思潮、社会发展模式在全世界的传播。在土耳其，知识分子一词在相当长时期内等同于“西化主义者”，而开明的上层官僚主导的“现代化”几乎是“西化”的同义词。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现代化遇到全球性挑战，出现危机，回归传统的浪潮席卷全球，文化的本土性认同日益增强，人们普遍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中东地区对全球性的后现代浪潮的回应则表现为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是整个中东伊斯兰思潮的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传统回归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全球化的表现和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和中等职业技术阶层是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他们主要来自教育界、新闻界、企业界（管理人员）、演艺界和政府部门等，这些行业的兴起主要是受到了近几十年土耳其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推动，所以与全球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阶层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教育的发展。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是10%，1973年识字率则达到近60%，1982年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达70%，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934年的2.5万人增

至1970年的16.4万人和1978年的30万人。<sup>④</sup> 实行多党制以来，通讯和传媒也有巨大的发展。报刊种类由1945年的154种增至1950年的477种，1995年达787种。据估计，1978年土耳其报纸日发行量达250万份。书籍、收音机和电视机也在大量增加。传媒和教育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解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思想扩散主要是伊斯兰知识分子利用发达的媒体传播的结果。在土耳其国内受教育的下一代与凯末尔主义的军事、官僚精英们有明显不同。凯末尔主义者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深重影响，积极推进西化和世俗化改革。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下一代是在国内学校接受教育的，与西方的联系非常疏松。他们不能希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西化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对他们和国家权力的控制，阻碍了他们在政治上向上发展的道路，使他们不愿认同于世俗主义思想，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伊斯兰价值和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校园中的伊斯兰运动实际上是学生们以伊斯兰教为武器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新闻媒体规模的扩大，使受教育阶层的政治参与广度和深度日益加大，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或有西方价值取向的精英。文化斗争是知识分子和中等职业技术阶层改善自身地位的显著特征，伊斯兰主义思潮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向凯末尔主义者发起的挑战。他们对土耳其的西化道路提出质疑，为伊斯兰主义思潮的流行作出了贡献。

19世纪开始，土耳其实行了一系列以西化为目标世俗化改革。凯末尔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土耳其创出西方文明。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殖民地纷纷摆脱西方的控制获得独立，沉重打击了西方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东亚经济的崛起更加消解了西方的影响力。随着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

<sup>1</sup> See H. Gulalp,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Muslim World*, January 1999, pp 29- 32

<sup>④</sup> Walter Weiker,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From Atatürk To The Present Day*,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1, p. 161

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凯末尔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欧洲文明的普世性标准正在受到解构,以西方文明为现代性基础日益受到削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欧洲文明的特征看成是地区性的,并不适合于所有民族与国家。

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当代土耳其社会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发展受阻、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1994 年出现了土耳其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陡降,多年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94 年达 150%,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平均失业率为 8.4%,城市地区高达 12.8%,1994 年失业人数为 60 万。贫富分化和悬殊现象更是触目惊心,1987 年土耳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 750 万人,1994 年增至 1 000 万人。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对西化道路的怀疑日益

加深,转而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解决的方法。土耳其现代 Q 化的危机导致了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的主题,诸如反西方主义、支持边缘人群与中心的斗争、强调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等,在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伊斯兰主义是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sup>1</sup>这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邢永平)

<sup>1</sup> 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第 110~111 页。

## 学术动态

# 荷兰的非洲学研究简介

安春英\*

1948 年,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建立,标志着荷兰学者将非洲学科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系统研究。50 多年来,荷兰已形成以莱顿大学为核心、由国内其他多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广泛参与的跨学科综合性非洲学研究体系。总体上看,荷兰的非洲学研究实力和影响在欧洲享有较高地位,且是“欧洲跨学科非洲研究集团(AEGIS)”的核心。2002~2006 年,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要有 3 个研究课题,即:经济、生态与脆弱性;文化、政治和不平等;非洲人的行为:跨越时空,解读非洲社会文化变迁。该中心还不定期组织非洲问题研讨会和放映非洲国家的原版电影。此外,荷兰的一些研究所和高校研究领域也涉猎非洲问题。

荷兰的非洲学注重合作研究。荷兰作为“欧洲跨学科非洲研究集团”创始国之一,积极推进非洲研究在欧洲的一体化趋势,邀请其他国家的非洲学者到荷兰进行学术访问或从事课题合作研究。而且,荷兰的一些研究机构与非洲的相关研究所或高校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荷兰学者不定期到非洲从事实地调查,非洲国家的研究所为他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便利条件;非洲学者尤其是博

士生在荷兰的资助下,可到荷兰进行短期学习和研究,双方共同参与研究项目和承担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开展双向交流活动。荷兰非洲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是:(1)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如何认识非洲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和非洲具有的研究价值?荷兰国内公众对此争论不一。(2)近年来,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文化形态、社会生活等诸领域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何科学地解读这些变化?非洲学研究人员现有的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难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当前颇具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诠释一些现实问题也面临理论危机。(3)非洲学研究也面临资金不足和影响吸引人才的困境,从而阻碍了非洲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邢永平)

\*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